

# 论 COEOPHOCTE

On COEOPHOCTE

安启念 中国人民大学

An Qinia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英文提要]

This paper purports that COEOPHOCTE is a central concept in Eastern Orthodox and Russian cultures.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the reforms of Czar Peter the Great precipitated a clash between Russian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the process, the notion of COEOPHOCTE was born. COEOPHOCTE signifies the awakening of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In essence, it believes that "a people who are free will unite on the foundation of love"—a concept distinct from "unity without freedom" as in Roman Catholicism, or "freedom without unity" as in Protestantism. COEOPHOCTE found social support from the Russian peasant commune, a widespread social institution throughout Russia even in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COEOPHOCTE, embodied in the spirit of the peasant commune, was also reflected in Russia's philosophy of religion and cultural thought. It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Russian culture. Eastern Orthodox doctrinaires tried to regulate Russian religious life in the name of COEOPHOCTE. Herzen and Populism saw in COEOPHOCTE a hope of deliverance from Western capitalism for Russia, and perhaps the world at large. The deepening and broadening of this notion further resulted in a Russian philosophy founded

on the “all—unity”. The rich and glorious legacy of Russian literature is also inextricably connected with the notion of СОЕРОНОСТЬ.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nd later the socialist system of Soviet Russia all bear the imprint of СОЕРОНОСТЬ as well. With 20th century drawing to a close, and various global problems threatening the survival and well being of the human race, a brand of Russian soteriology has quietly been resurrected, again suggesting СОЕРОНОСТЬ as the gospel for our world today.

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СОЕРОНОСТЬ 被认为是最能体现俄国东正教和俄罗斯文化特色的十分重要的概念。俄罗斯科学院 E. C. 特洛伊茨基院士指出:在许多俄罗斯学者看来,“СОЕРОНОСТЬ 是俄罗斯哲学、东正教神学和俄国国家思想——俄罗斯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sup>①</sup> 这一概念对于理解俄罗斯宗教哲学、俄罗斯文化,乃至 19 世纪以来的俄罗斯历史,均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来源、含义、背景、意义等方面对它做一简要考察。

对于 СОЕРОНОСТЬ 这一概念,研究者多从俄语词源学着手研究其内涵。例如,出版后在俄罗斯获得好评的由莫斯科大学 M. A. 马斯林教授主编的《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словарь》一书,其中“СОЕРОНОСТЬ”条一开始便指出,该词在词源学上与“СОБОР”一词有关,在俄语中,СОБОР 有两层含义:1. 为解决某个问题而召集的当选人或负责人会议;2. 供僧侣们礼拜用的教堂。不论哪种含义,

<sup>①</sup> E. C. Троицкий《Что такое русская соборность?》, м. 1993, стр. 4.

都有把人们汇集在一起共同交流、协商的意思。<sup>①</sup>这样做当然是必要的,但仅仅这样做远不能揭示 СОБОРНОСТЬ 概念的深刻内涵。СОБОРНОСТЬ 一词在俄语中古已有之,但作为东正教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被人们深刻认识,是俄罗斯民族意识觉醒的产物,是俄罗斯文化与西欧文化碰撞的结果,是和 19 世纪中叶俄罗斯杰出思想家、宗教学家霍米亚科夫的名字分不开的。

公元 9 世纪,基督教传教士,希腊人基里尔、梅福季兄弟由拜占庭来到斯拉夫人中传教,他们创造了斯拉夫字母,并将几部祈祷书由希腊文译为斯拉夫文,翻译中,他们把 καθολικός 一词译为 СОБОРНЫЙ(СОБОРНОСТЬ 的形容词)。19 世纪时,天主教耶稣会士加加林指摘这一翻译歪曲了希腊文的原意,认为原文指“全世界的”、“普遍的”,主要是指地理范围,СОБОРНЫЙ 则含义模糊,不确定。这一指责引起俄罗斯思想家霍米亚科夫的强烈不满,他专门撰文予以反驳。霍米亚科夫指出,καθολικός 一词,按基里尔兄弟的理解,不是由 καθ(一致)与 ὅλα(普遍、处处;从地理上看或从民族上看)构成的,而是由 καθ 与 ὅλου(整体)结合而成。<sup>②</sup>καθολικός 不是指地理或民族的范围,而是指一种性质,一种教义,指不同成分集合而成的整体性,强调这种整体性正是基督教的基本特征。<sup>③</sup>基里尔兄弟本身便是希腊人,他们对希腊文的理解应当是可以信赖的。加加林的说法,反映的是天主教的观点,天主教所热衷的是势力范围的扩大,它对基督教的理解并不符合基督教的原义。基里尔兄弟把 καθολικός 译为 соборный 是完全正确的。

当今的俄罗斯学者认为,霍米亚科夫在这里所做的词源学考

① 见《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словарь》, м. 1995, стр. 452.

② 见《Хомяков》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 2, м. 1994 стр. 242.

③ 参见 Никита Струве:《О соборной природе церкви》,《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культура》, м. 1992, стр. 182.

察是“纯粹的杜撰”，<sup>①</sup>但他在这番考察中所表达的对基督教及 СОБОРНОСТЬ 概念的理解，却是十分重要的，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他所说的翻译问题本身。霍米亚科夫认为，“СОБОР”所表达的是会议的意思，它不是由不得不服从的力量把人们聚集在某个地方，而是在没有外力作用下，人们靠一种内在的力量自觉自愿地集合在一起，形成“多样性中的统一”。<sup>②</sup>СОБОРНОСТЬ 所体现的是人们出于对上帝的爱以及由此而来的相互之间的爱而聚集在一起，“这是在最大程度的多样性的条件下最大可能的统一。”<sup>③</sup>霍米亚科夫强调，СОБОРНОСТЬ 这一概念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内容。第一是自由，第二是统一。它是指多种成分统一而成的整体，但每个成分在这一整体中又是完全自由的。他的这种理解突出的是肯定个性自由的内在的统一，他所批评的加加林对基督教的理解，则是指外在的一致。由 *καθολικός* 的斯拉夫文译文而引发的争论，反映了霍米亚科夫及斯拉夫人在对基督教的理解上与天主教徒的不同，是两种观点碰撞的产物。СОБОРНОСТЬ 这一斯拉夫文古已有之的概念，只是在这种碰撞中，经过霍米亚科夫的阐释，才以标志俄罗斯东正教及俄罗斯文化独特之处的概念而流行于世。

不仅 СОБОРНОСТЬ 的阐释与受到重视源自霍米亚科夫对天主教学者的批评，而且它一经霍米亚科夫阐释便成为他本人及众多的斯拉夫思想家、东正教哲学家与西方思想和西方理论斗争的旗帜。霍米亚科夫把 СОБОРНОСТЬ 作为东正教的根本性特征和重要优点，视为东正教与天主教、新教的主要区别所在。他认为，罗马天主教中教皇的权威虽然维护了教会的统一，但同时从外部扼杀了人们的自由；新教则给了人们自由，但又因个人主义盛行而使统

① 《Хомяков》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 1, СТР12; Том 2, стр. 412.

② 同上书, Том2, стр. 242.

③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культура》, стр. 182.

一不复存在。前者是没有自由的统一,后者是没有统一的自由。东正教的 СОБОРНОСТЬ 克服了二者的缺点,实现了自由与统一理想结合。这种结合的基础是人们对上帝及相互之间的爱,它是以此为基础的内在的统一。西方社会中的统一则纯粹是形式上的外在的统一,与博爱精神毫无关系。对这种情况,他形象地做了描述:

“在欧洲,可以听到三种最响亮的声音:

‘服从并相信我的命令’——罗马这样说。

‘你们是自由的,努力为自己创立某种信念吧!’——新教这样说。

教会(按霍米亚科夫的用法,特指东正教教会。——引用者)则向自己的教民们呼吁:‘让我们相互爱吧,我们一致信仰圣父、圣子、圣灵’。”<sup>①</sup>

在霍米亚科夫看来,СОБОРНОСТЬ 是神的世界和世俗世界的中介,是基督教精神的具体展现,它既反对破坏人类团结的个人主义,也反对吞噬个性的集体主义,它以个人的自由和人们相互之间的爱为基础。是俄罗斯东正教特有的文化精神。

霍米亚科夫之所以对 СОБОРНОСТЬ 做了如此解释并把它作为俄罗斯东正教特有的思想精神,是有深刻原因的。霍米亚科夫生活于 19 世纪上半叶,这是一个产生了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赫尔岑、果戈里、别林斯基的时代,被人称为俄罗斯文化的黄金时代。这一时代的出现,是自 18 世纪初彼得改革向俄罗斯大量引入西方科学技术与规章制度,特别是他的继承人叶卡特琳娜二世在俄罗斯大力推广西方思想文化之后,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的产物。由于在一个多世纪中俄罗斯走上了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由于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俄罗斯人开始思考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思

<sup>①</sup> 《Хомяков》, том 2, стр. 195.

考要不要走西方的老路,以及俄罗斯历史、文化有别于西方的特点等等前所未遇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它为整个俄罗斯文化的崛起和繁荣创造了深刻的背景,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这种文化冲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许多知识分子身上都有突出的表现。例如,著名宗教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 И. В. 基列耶夫斯基早年曾是鼓吹西方文化优越性的西欧主义者,后来转而成为强调俄罗斯文化特殊性的斯拉夫主义的主要思想家之一。与霍米亚科夫同时,他也对西方文化、西方宗教思想和西方社会生活做了尖锐的批判。他在 1839 年写给霍米亚科夫的一封信里说:西方文明是理性主义对内在精神理性的胜利,这是一种片面性,它最终将导致失去信仰,导致普遍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膨胀了的功利主义与占有思想,因为基督教的情感在西方被随意地歪曲了。在俄罗斯则相反,信仰总是高于理性,理性总是高于常识,团体总是高于个人。<sup>①</sup>这番话表明,强调整体性以及人的内在精神生活的意义,批评西方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是当时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倾向,霍米亚科夫对 СОВОРНОСТЬ 的阐释与强调,不过是这一倾向在宗教问题上的具体表现而已。

在这里,我们还要顺便指出,俄罗斯学者,例如 Н. А 别尔嘉耶夫,认为 СОВОРНОСТЬ 是无法译成外语的,它是俄罗斯独特的文化现象。<sup>②</sup>就中文而言,要翻译 СОВОРНОСТЬ 确有困难,因为在中文中没有在含义上完全与之对应的概念。在我国,有的学者把它译作“共同性”,(见雷永生、邱守娟译,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 1995 年版)显然与俄文原义相去甚远。也有的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贾泽林)主张译为“聚合性”。这一译法基本上是准确的,但似乎又有贬低个人的自由、独立之嫌,过于夸

<sup>①</sup> 见 И. Киреевский:《Критика ц эстетика》, м. 1979, стр. 145—148.

<sup>②</sup> 见《О России и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м. 1990, стр. 187.

大了“合”的一面。笔者本人主张译为“集合性”，认为它较之“聚合性”稍微突出了人的自由和独立，更切近“自由人的联合体”之义。不过笔者认为“集合性”仍未反映出 СОБОРНОСТЬ 原有的复杂内涵，使用时仍需要另加说明，不能令人满意，究竟怎么译为好，有待进一步讨论。

## 二

作为最先明确提出并阐述 СОБОРНОСТЬ 概念的人，霍米亚科夫主要把它用于对基督教教义与教会生活的论述，把它作为教会生活的本质特征和主要优点。他和其他一些东正教理论家本着 СОБОРНОСТЬ 精神对教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做了全面的阐释。但他所说的教会，事实上专指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因为他认为 СОБОРНОСТЬ 是整个基督教的基本精神，而天主教和新教都有背于此，因而当讲到应当有的教会生活时，只能是指俄罗斯的东正教教会。其实，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现实中的俄罗斯东正教教义和教会生活并没有像霍米亚科夫所说的那样，任何时候都表现出 СОБОРНОСТЬ 的特点，СОБОРНОСТЬ 只是霍米亚科夫想像中的俄罗斯东正教，从而也是整个基督教，所应当具有的特点，或理想状态，反映的是他力图改革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生活和基本精神的愿望。只是由于他所论述的 СОБОРНОСТЬ 思想得到众多俄罗斯哲学家、神学家和其他学者的赞同，才对俄罗斯哲学、神学及社会理论产生重大影响，成为俄罗斯文化的一笔重要财富。

根据霍米亚科夫及其他俄罗斯东正教理论家，СОБОРНОСТЬ 同时既是教会的实质，也是教会应当完成的任务。基督教所说的拯救，其目的就在于不是用剑以及其他强迫性手段，而是用在自由和真理中的爱，把全人类统一在一起。体现了 СОБОРНОСТЬ 精神的

教会,是无处不在的教会,是一种统一的存在,是一个整体,在这样的教会中,个别服从一般,但一般并不压迫个别;统一并不与多样性相矛盾,而且相反,它以多样性为前提;等级、权力并不压制人民,同样,人民也并不把等级和权力消融在自己之中。<sup>①</sup>有的学者强调 СОБОРНОСТЬ 是最大程度多样性的最大程度的统一,他们把“圣灵降临节”当作 СОБОРНОСТЬ 的教义基础,指出,那些属于同一个民族讲同一种语言的人获得讲各种各样语言的能力,这并不导致他们相互疏离,反而使他们得到更大的统一。<sup>②</sup>

由于 СОБОРНОСТЬ 所体现的是自由与统一的结合,所以俄罗斯神学家及教会人士中有人认为应该对一般教徒和教会人士双方均提出相应的要求。著名教会活动家 Ф. А. 萨马林说:“我们应该记住,由于 СОБОРНОСТЬ 原则,任何一个教会成员都无权漠不关心地对待教会的事务,都不能认为那些主管这些事务的人自己知道该怎么做,用不着人们帮忙和提建议。因此,我们这些在俗的教徒,应当认识到,即使是我们也对教会生活中的那些我们非常愿意揭露出来的无序和混乱现象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但是,请允许我说,从教会当局这方面看,由于充满了 СОБОРНОСТЬ 精神,它不应当过于信赖自己而对普通信徒的意见漠然置之,因为它应当记得,普通信徒也并没有被剥夺掉圣灵的赐惠。所有赞成 СОБОРНОСТЬ 的人都应该相信,对于教会机构本身而言,它必须倾听教会全体成员自由发表的意见,因为只有全体教徒的自觉参与之下,教会的活动才能成功。”<sup>③</sup>在天主教中,教皇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俄罗斯东正教则本着 СОБОРНОСТЬ 精神,认为人民便是圣体,他们才是信仰的保护者。霍米亚科夫指出,任何一个教会组织,以及牧首自

① 见 Н. Струве:《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культура》,стр. 182.

② 同上。

③ 转引自《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культура》,стр. 184.



己,都不是真理的化身,只有作为整体的教会,才能充当真理的承担者。

各教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应该体现出 СОБОРНОСТЬ 精神。司徒卢威说:“每一个地区教会的 СОБОРНОСТЬ 本质,决定着全世界教会的统一,决定着各教会之间的关系。与罗马不同,东正教教会认为任何一个地区教会在实质上都与其他教会没有什么不同,都没有更大的权力。东正教教会承认有的教会占有最重要的位置,但也只是把它视为统一的明显标记,承认有的教会是最受尊敬的或最古老的,‘在爱中起着领导作用’。但是,东正教反对一切形式的服从,也即反对一个教会不自由地依赖于另一个教会。”<sup>①</sup>

对于个人在教会中的生活,霍米亚科夫本着 СОБОРНОСТЬ 精神做了如下阐述:“人在教会中发现的不是某种异己的东西。他在教会中找到的是他自己,但在精神上孤立无援因而软弱无力的自己,而是由于在精神上真诚地与自己的兄弟,与救世主的统一而充满力量的自己。他在教会中得到完善,或者确切地说,找到了自身之中的完善的東西——神的感召,在每个单独的个人存在的不应该有的不道德行为中,这种神的感召正在不断地丧失。人的净化是由基督徒在耶稣基督中的相互之爱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完成的,因为这种爱是上帝的基本精神。”<sup>②</sup> 霍米亚科夫强调,真正的基督教使每一个信徒都是自由的,信徒不承认居于自己之上的任何外在权威。但是,由于接受了神赐,信徒不能随意行事,他只能在与教会的思想一致中实现自己的自由。

不过,这里可以顺便指出,霍米亚科夫通过 СОБОРНОСТЬ 理论所宣传的这些观点并没有被当时的东正教教会所接受,他的著作只能在国外发表,他刚刚去世,马上有报纸称他为异端邪说的制

①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культура》, стр. 184—185.

② 《Хомяков》, том 2, стр. 87.

造者。

СОБОРНОСТЬ 思想在俄罗斯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在霍米亚科夫那里,它是霍米亚科夫整个宗教史理论(实际上也是社会历史理论)的具体表现。霍米亚科夫在自己的著作《世界史札记》中把历史上的全部宗教分为两类,即伊朗主义的(ИРАНСТВО)和库什主义的(КУШИТСТВО)。属于前者的有古伊朗的宗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属于后者的有湿婆教(即印度教)、佛教、拜火教、巴尔教、古希腊罗马的多神教等等。二者的区别在神与世界的关系上。前者认为世界是神从无到有的自由创造;后者认为世界是遵从严格的因果链条的必然性的产物。伊朗主义的精神实质是崇拜作为创造性自由的精神,因此承认个人的道德自由和内在信仰自由。它主要以文学与音乐为表现形式,注重综合和整体性,库什主义崇拜作为必然的事实生活,例如佛教崇拜一种只知在自我消灭中去寻求自由的奴颜婢膝的精神。在哲学中,库什主义表现为理性主义,它用有条件的东西取代无条件东西,用片面的东西取代整体,用外在的东西取代内在的东西,注重分析。<sup>①</sup>霍米亚科夫认为基督教是伊朗主义的最高表现,但是罗马歪曲了基督教精神,把信仰变成了法律,把教会变成了尘世的社会,“精神自由的整体性被隐藏在法律外壳下的理性所打碎。”<sup>②</sup>由于东正教的中心,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的毁灭,伊朗主义在忠实地保持了基督教精神的俄罗斯得到继承。俄罗斯是第三罗马,它保留了圣徒教会的理想——СОБОРНОСТЬ,而 СОБОРНОСТЬ 所体现的正是伊朗主义。

伊朗主义和库什主义不仅仅是宗教理论,而且是世界观,它们在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中,在不同的文明中,也得到表现。霍米亚科夫认为,伊朗主义是那些承认上帝是世界的基于爱的原则的创

<sup>①</sup> 参见 В. А. Кошелев:《Алексей Степанович Хомяков》,《Хомяков》, том 1 стр. 10.

<sup>②</sup> Хомяков:《Записки о всемирной истории》,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1900. т. 7, стр. 448.

造者并且有自由精神和道德责任心的民族的世界观,从地理上看,这是指居住在伊朗、高加索—阿拉拉特高地、北部印度、米多巴特利地带的民族。库什主义是巴比伦、埃及、中国、南部印度等地民族的世界观,它承认以泛神论面目出现的融入世界的神,或具有印度教色彩的融入神的世界。它们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它们的斗争是自由与必然的斗争。这表明,СОБОРНОСТЬ理论只是霍米亚科夫整个世界观、社会历史观和宗教观的一个部分,或一个具体表现,是他的社会理论在教会问题上的折射。

### 三

霍米亚科夫所提出并加以论述的 СОБОРНОСТЬ,它的“根”在哪里?俄罗斯学者认为,在俄国的农民村社。霍米亚科夫本人认为 СОБОРНОСТЬ精神在农民村社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他还因此而主张在工业中也建立村社性的组织,把村社原则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他说:“斯拉夫民族,主要是俄罗斯人,不同于其他所有民族之处,在于它的村社生活。新的思想运动就是以此为开端的。”<sup>①</sup>霍米亚科夫的追随者,神学家、历史学家 Ю. Ф. 萨马林也把俄国的村社生活作为 СОБОРНОСТЬ的体现,认为 СОБОРНОСТЬ思想是对现实的俄国村社生活的概括和总结。

农民村社是世界各地曾普遍存在过的一种历史现象,是原始社会组织的遗迹。只是由于俄罗斯特殊的历史条件,直到 19 世纪,甚至 20 世纪初,仍是农村组织的主要形式,全国大多数人口生活在村社之中。村社是农民进行自我管理的一种形式,其主要权力机构为村民大会。村民大会每一年或几年召开一次,实行充分民主,

<sup>①</sup> 《Хомяков》,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1890, ТОМ 3, стр. 2.

一切重要决定都经过大会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大会的主要工作有:选择公职人员,重新分配土地,分派赋税、徭役,确定用于村社集体开支的款项,审核赋税征收人和储备粮看管人的报告,主持分家,确定孤儿的监护人,等等。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广泛的内部民主是村社生活的主要特点。尽管村社事实上只是俄国封建沙皇统治和农奴制的一个基层组织,但在19世纪中叶,它的意义却被许许多多的俄国知识分子大大地夸大了。

自从18世纪初彼得大帝推行以向西方学习为基本内容的改革以来,俄国社会有了飞速的发展,走西方国家的路,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曾经是俄国上下的共同心愿。但是,1789年的革命首先使俄国社会上层感受到西方道路所含的危险。19世纪上半叶西方日趋激烈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残酷的1848年革命以及日益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使几乎全部是贵族出身的俄国知识分子进一步看到西方道路除物质繁荣之外的另外一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俄国社会出现了对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对俄罗斯自身的特点,对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和俄罗斯应走的道路的深入广泛的思考与争论。这种情况大大地激发了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到19世纪30年代及其以后,俄罗斯出现了一股以批评西方道路、西方文化为特点的强有力的社会思潮。早在19世纪20年代的十二月党人那里就表现出对俄国社会文化特点的深切关注(例如“南方协会”的领导人П. И. 佩斯捷利),然后是以突出俄国特点反对步西方后尘为特点的斯拉夫派,紧接着有由赫尔岑发轫的社会主义思潮,再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一度声势浩大的民粹派运动,直至19世纪末在俄国兴起的马克思主义,甚至包括1991年解体终结的苏联,都具有批评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这一共同特点。

这里所说的西方国家,实际上是指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

最大弊端在于劳动人民的非人处境以及由此激发的阶级对抗和流血革命。俄国知识分子认为,这一弊端的产生原因,是西方的以个人主义和片面追求科学理性为特点的文化。因而,为了使俄罗斯避免西方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所经历的苦难,俄国知识分子“发现”了俄国农民村社,对它的民主精神和没有阶级分裂阶级对抗的日常生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从十二月党人、斯拉夫主义者、赫尔岑到民粹派,乃至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或事实上认为农民村社的存在是俄国的一大幸事,是使俄国有可能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希望所在,甚至是使全人类从资本主义厄运中解放出来的希望所在。他们深入研究并广泛宣传和赞扬村社精神,明显地夸大了村社生活的意义。

那么究竟什么是村社精神?俄罗斯学者认为就是个人自由与集体生活的结合,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及由这种统一构成的整体性。他们用“合唱”来描述村社所体现的整体性和个人与集体的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关系。19世纪俄国著名学者 K. C. 阿克萨科夫说:“在村社里,个人并没有受到压抑,他只是失掉了自己的野蛮、片面性和利己主义……个人在村社中被吞掉的只是自己的利己主义方面,他在村社中是自由的,就像他在合唱中享有自由一样。”<sup>①</sup>

村社是理解俄罗斯文化的钥匙。长期的村社生活在俄罗斯人的灵魂中积淀为一种文化精神。从上述村社精神出发,俄罗斯学者把由自由个体构成的统一和谐的整体视为一切存在的最高境界,把由此构成的整体性视为一种世界观,视为俄国社会和俄罗斯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他们用这种世界观解释基督教,理解俄国传统,建构俄国的社会生活,批判西方文化。霍米亚科夫提出并论述

<sup>①</sup> 转引自 В. В. Зеньковский:《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Ленинград 1991, ТОМ 1, часть 2, стр. 36.

的 СОБОРНОСТЬ 正是村社精神的集中体现,他所做的工作只是俄罗斯学者上述工作在宗教问题上的具体表现或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由于 СОБОРНОСТЬ 精神深深扎根于俄国社会生活与历史传统之中,集中体现了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特征,它在俄罗斯社会深入人心,在霍米亚科夫之后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对 СОБОРНОСТЬ 思想的运用已远远超出东正教神学的领域,它作为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特征,成了俄罗斯社会历史理论和哲学理论的重要概念。许多学者并不直接使用 СОБОРНОСТЬ 概念,但实际上却全面接受并力图丰富它的内涵,在自己的各种范畴和理论中体现出了 СОБОРНОСТЬ 的基本精神。

在霍米亚科夫之后,СОБОРНОСТЬ 首先被着重强调俄国特点的斯拉夫派所接受。著名斯拉夫主义者 В. В. 基列耶夫斯基的思想与 СОБОРНОСТЬ 十分接近,以致有人把他与霍米亚科夫共同作为 СОБОРНОСТЬ 思想的创立者。К. С. 阿克萨科夫首次把 СОБОРНОСТЬ 社会学化了,把它与村社等同起来,并认为斯拉夫民族的全部社会生活都是由村社的特点决定的,应当用村社精神,也即 СОБОРНОСТЬ,组织社会,坚决反对在俄国建立西方式的法律制度。

使 СОБОРНОСТЬ 思想得到极大发展的是 В. 索洛维约夫。索洛维约夫本人拒绝使用 СОБОРНОСТЬ 概念,希望以此有别于斯拉夫主义者,但他却不但像霍米亚科夫及其他斯拉夫主义者一样对西方社会、西方文化及天主教与新教的片面性加以批判,而且特别强调整体性的重要,把以爱为基础的自由统一——СОБОРНОСТЬ 的基本精神,发展为一种系统的哲学理论——万物统一哲学。

俄罗斯学者习惯上把 1874 年索洛维约夫硕士论文《西方哲学的危机——反对实证主义者》作为万物统一哲学诞生的标志。针对

实证主义者一味注重经验和理性,把科学与宗教对立起来的作法,索洛维约夫强调世界本身以及人对世界的认识的整体性。他认为欧洲哲学的主要缺陷在于抽象的理性,这种抽象的理性破坏了世界本来的统一,应当通过把各种抽象原理与宗教信仰、直觉等从整体上把握活生生的世界的方法结合起来,揭示出世界的整体性存在。在本体论意义上,万物统一是最重要的原理,这是一切存在在绝对物——上帝中的自由结合与统一。索洛维约夫把他所主张的理论称为“肯定的万物统一”。他说:“被我称为真正的或肯定的万物统一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统一物不是依赖于万物或靠损害万物而存在,而是有益于万物。虚假的、否定性的统一压迫或吞噬进入它的各种因素,因而它自身空无一物。真正的统一保留这些因素并使之得到加强,作为一种完满的存在,在它们之中得到实现。”<sup>①</sup>由此可见,所谓万物统一与 СОБОРНОСТЬ 一样,也是自由与统一的结合,它是 СОБОРНОСТЬ 的进一步发展。

索洛维约夫于 1900 年去世,此后不久,俄罗斯涌现出一大批各具特点的哲学家,其中绝大多数人程度不同地接受了索洛维约夫的万物统一思想,Соборность 精神在俄罗斯哲学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 1922 年以后,大多数索洛维约夫思想遗产的后继者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境。这些人在境外做了大量努力,使俄罗斯哲学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但终因远离故土,后继无人,随着他们在二战前后的去世,俄罗斯哲学在境外消声匿迹,Соборность 思想也暂时退出了舞台。

<sup>①</sup> 转引自 В. Н. Акулинин:《Философия всеединства》,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0,стр. 54.

#### 四

作为俄罗斯文化核心的基本的概念之一,СОБОРНОСТЬ对俄罗斯人并进而对俄罗斯的社会生活和各个思想领域,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

就哲学而言,СОБОРНОСТЬ不仅在万物统一哲学这样的世界观中得到体现,而且在其他问题上也表现得非常突出。例如在认识论里,从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这些斯拉夫主义的奠基人开始,直到建立了系统的认识论理论的索洛维约夫,都强调认识的整体性;坚决反对欧洲哲学对感性经验或者理性的推崇,认为世界,包括认识对象和从事认识的人,处于有机的统一之中,是一个整体,仅仅从感性出发或者仅仅从理性出发,甚至把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相区分这一作法,都破坏了世界固有的统一,因而都是不可能得到真理的。基列耶夫斯基还为此专门提出“活知识”这一概念,以突出知识的整体性,和西方国家过于推崇理性思维的作法相对立。他认为认识的主要任务是要形成特殊类型的思维——信仰思维,实现理性和信仰的结合,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丰富。按霍米亚科夫的理解,活知识也就是整体性知识,它是感性经验、理论理解和神秘直觉(宗教信仰)的有机统一,只有实现了人的各种精神力量的完整统一,才可能理解世界的真正存在和上帝的超理性本质。霍米亚科夫还特别强调,由于人是处在与上帝和教会的统一中的存在,也即处在СОБОРНОСТЬ之中,因此个别人的思想是不能把握真理的,只有以爱集合在一起的思维的总和,才能克服主观性等有害倾向,认识真理。索洛维约夫也认为知识是人与存在的活生生的直接交流,真理具有具体的整体性,无论单纯的感性还是理性均不可能把握它。存在自身有现象、观念和绝对存在三种形式,与此相应,认



识也有经验、理性和神性直觉(信仰)三种。在这三种认识形式中,信仰处于中心的地位,因为只有它才能为整体性的知识提供可能。按照万物统一论,一切存在,也包括人的认识活动在内,构成一个以绝对物、神作为最终基础的有机整体,对这一整体的认识是一切认识的基础。有的学者把上述对认识的整体性的强调统称为认识的 СОБОРНОСТЬ 思想,并认为它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认识论的立足之点。概括地讲,这种理论主张,只有把认识、审美、情感、道德、宗教等因素在意志和爱的参与下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认识世界。

长期以来,人们惊叹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俄罗斯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巨大成就,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作品中那种抑郁深沉的精神气氛的震撼人心荡涤人的灵魂的巨大力量,是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成果中所少有的。原因何在?正在于 СОБОРНОСТЬ 思想之中。西方国家过于看重科学理性的作用,在认识论中片面强调感觉经验和逻辑推理,而俄罗斯人重视的是世界的整体性,突出从终极关怀的高度以直觉、顿悟等神秘形式对世界的总体性体悟和领会。正是这一特点使俄罗斯人更擅长以形象思维从总体上把握现实生活,因而富有艺术表现的才能;更能深入生活的实质和人的灵魂深处,因而其文艺作品具有罕见的穿透力和震撼力。

СОБОРНОСТЬ 起初是作为东正教神学的重要概念提出来的,由于东正教在长达十个世纪的生活中一直是俄罗斯文化生活的中心,又由于 СОБОРНОСТЬ 思想的社会基础,农民村社,长期是俄国绝大多数人(农民)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СОБОРНОСТЬ 思想早已融化在广大俄罗斯人(不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血液之中,因而它的影响也远远超出文化领域。一百多年来的俄国历史,便带有 СОБОРНОСТЬ 思想的深刻烙印。

如前所述,把农民村社和 СОВОРОНОСТЬ 当作俄罗斯文化的精髓,当作使俄罗斯避免资本主义灾难并拯救全人类的希望,在俄国早已有之,这一思想贯穿自 19 世纪以来俄国的全部社会革命之中,其中最典型的是村社及 СОВОРОНОСТЬ 与社会主义运动的联系。

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初,德国贵族盖克斯特豪森在俄罗斯旅行时便发现并高度评价了俄国农民村社的意义。他在其著名的《俄国人民生活的内部关系,特别是农村结构的调查报告》中称:“俄国村社中有一种组织上的联系,作为它的基础的是一种在任何其他国家中所没有的牢固的社会力量和秩序。村社使俄国得到了一种无法比拟的好处,这就是,在这个国家中迄今没有无产阶级,而且当这种村社制度还存在的时候,无产阶级也不可能形成。”俄国的农奴制“无非是颠倒过来的圣西门主义”。<sup>①</sup> 赫尔岑则说:“我们所说的俄国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思想,它所依据的是土地和农民的日常生活,是事实上的份地和存在着的土地重分,是村社拥有和村社管理,它以劳动者的组合去实现社会主义所普遍追求并得到科学证明的经济公正。”<sup>②</sup> 俄国民粹派曾为在俄国建立村社社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努力,他们的突出特点也是把村社生活和 СОВОРОНОСТЬ 理想化。写于 60 年代的一份民粹派文献这样说:“1848 年的失败如果说能证明什么的话,那就是只能证明一点,即这次尝试对于欧洲是失败的,但不能说明在我们这里、在俄国不可能建立其他的制度。难道欧洲的经济条件和土地条件与我们的相同吗? 难道他们有农民村社吗? 他们可能存在农民村社吗? 难道他们的每一个农民和每一个公民能成为土地所有者吗?”

① А. : Гакстгаузен;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внутре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родной жизни и в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ельских учреждений России》, м. 1870, стр. 81, 72.

② А. И. Володин; 《Утопичес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м. 1985, стр. 40.

不。而我们则能。”<sup>①</sup>

在 19 世纪以来的俄国革命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运动了。不少人都对这场运动与俄国传统的关系做过探讨,其中最著名的是 Н. А. 别尔嘉耶夫的《俄国共产主义的由来与意义》一书。别尔嘉耶夫在这本书中专门写了一章——“共产主义和基督教”,论述布尔什维克运动与俄国东正教的多方面联系,其中也谈到了 СОБОРНОСТЬ、整体性思想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不过由于该书问世较早(1937 年),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着墨较多,而对 1936 年宣告建成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与俄国传统的关系几乎没有涉及。实际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它所建立的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几乎就是十月革命前俄国农民村社的新版,在集体经济、自我管理、平等原则、邻里互助等方面十分相似。而苏联广为宣传的集体主义,理论家们和党的领导人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非常鲜明地体现了俄国传统中的 СОБОРНОСТЬ 思想。按别尔嘉耶夫的说法,整个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各方面看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俄国东正教思想的表现。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它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布尔什维克运动的文化背景的一个重要角度。

文化是民族的性格,具有惊人的稳定性。时至 20 世纪末,СОБОРНОСТЬ 仍然是俄罗斯人的文化骄傲和济世良方。例如,时间进入 90 年代,俄罗斯社会危机四伏,矛盾重重,整个人类为危及自己生存的各种全球性问题所困扰。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学者再次把 СОБОРНОСТЬ 祭为法宝。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Е. 特洛依茨基于 1993 年出版了《什么是俄罗斯的 СОБОРНОСТЬ?》一书,提出:“为了巩固俄罗斯国家及其独立性和权威,为了保障社会公正并为经

<sup>①</sup>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9 页。

济改革提供群众基础,必须恢复神圣的 СОБОРНОСТЬ,这是俄罗斯公民的爱国主义使命和责任。<sup>①</sup>“东正教的 СОБОРНОСТЬ 促进着保持从上天得到的美满幸福,帮助获得人与信仰的统一,人与自己的民族、国家、家庭及自然界的统一,帮助实现与其他民族的和谐交往,实现各种爱国力量的团结、个人的意志专注,它既保障着人的幸福与精神自由,也保障着社会健康和期待已久的民族团结。”<sup>②</sup>СОБОРНОСТЬ 简直是万应灵丹了。

100多年前的斯拉夫主义者曾把 СОБОРНОСТЬ 视为人类从资本主义灾难中解放出来希望所在,长达70多年的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实验也在事实上把 СОБОРНОСТЬ 作为自己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之一,今天,面对环境、资源、核战争威胁等全球性问题,不仅是特洛依茨基院士,许多俄罗斯学者都再次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 СОБОРНОСТЬ 及其他一些东方文化的思想观念之上。他们认为,今天人类面临的危机,从深层看是西方文化的必然结果;人类要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克服个人或民族的利己主义,克服片面理解的科学理性,把人类以及人与自然界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放弃片面追求物质利益的作法,给精神生活以更多的关注;抛弃征服自然的欲望,在对全人类和自然界的爱的普照之光的照耀下,在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进行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建立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友爱关系。总之,人类当前面临的问题,根源就在于现有的以西方世界为代表的工业文明缺少整体性和 СОБОРНОСТЬ 思想。基于这种认识,今日俄罗斯有的人大谈 СОБОРНОСТЬ 的救世意义,也有的人大谈索洛维约夫的万物统一哲学,还有的认为必须用基督教,首先是东正教的思想重铸人类的灵魂。一种新的俄罗斯救世主义时有所闻,有的学者明确

① Е. Тронцкий:《Что такое русская соборность?》, м. 1993, стр. 3.

② 同上书, стр. 8.

提出 21 世纪将是俄罗斯文化的世纪。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斯焦宾院士态度比较全面公正。他除了肯定俄罗斯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的重要现实意义之外,也高度评价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无为”、“天人合一”等思想的现代价值,主张人类的唯一出路是开展东西方多种文化间的平等对话。<sup>①</sup> 尽管如此,在他的思想中,俄罗斯文化仍是人类的未来所必不可少的内容。

人类要靠俄罗斯文化来拯救,此说未必有多大市场,但俄罗斯文化,特别是 СОБОРНОСТЬ 思想,包含有十分深刻的、宝贵的理论内容,对基督教教会生活以及今日人类对未来的思考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价值,这一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

<sup>①</sup> 见 В. С. Степин, В. П. Толстых: «Судьба демократии и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Вопросы социологии», №10, 1996.